

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研究及其价值

严翹君, 李小红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江苏 南京 210004)

摘要:对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一是细分主体角度的研究;二是发生学视角的研究;三是功能意义上的研究。但还没有形成系统性拓展,欠缺规律性发掘;仍需加强场域性探究和功能性追索。深入研究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社会态度,有利于准确判断这一阶层成长、成熟和变动走势;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形成正确的政策选择;有利于社会和谐、团结稳定形成正确的意识形态思路。

关键词: 中国; 中产阶层; 社会态度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05(2011)08/09-0163-07

尽管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还充满着艰辛,但它的日渐壮大应该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其成长过程,事实上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艰难塑造橄榄型阶层结构中颠覆传统金字塔阶层结构的过程。在这样的塑造和颠覆中,中产阶层不断取得自身话语权,得以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这种社会态度表达,告诉人们他们可能的行动;同时,这种社会态度也会随着中产阶层的日渐壮大,而影响执政党的路线决策、政府的政策安排、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人们的文化价值走向。

一、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研究状况

学者对于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研究,几乎是与中产阶层的发育成长同步的,前期研究的重点主要落在是否存在一个当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层,如果存在,它的规模、结构和功能如何。这几年,对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社会态度的研究开始加强。对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细分主体角度的研究

细分主体角度的研究,基于这样一种前提:中国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统一成分的阶层,而是由多个分异主体组成的社会中间阶层。因此,研究者认为,对中产阶层中的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分别研究是必要的。这一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精英、新阶层和一般白领三个细分主体社会态度的探析上。

一般说来,知识精英是指中产阶层中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信息来源,对社会问题更为敏感,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的中产阶层成员。萧功秦将知识精英称为“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精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一般的中产阶层成员不同,比如与企业主相比,企业主往往对所属集团的利益十分关心而缺乏道德激情,然而总体态度却务实而稳健;而知识精英认知、情感、行为倾向往往与他们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确认的信仰、价值与理念,来选择社会改造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研究》(项目号:04BSH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严翹君(1950-),女,江苏南通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李小红(1972-),女,江苏南通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科研处副处长,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

与改良的行动。知识精英所具有的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性,往往又会导致知识精英希望以某种自己认为合理的、全面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社会工程的蓝图,来改造社会。^[1]王珺认为,从认知上来说,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是一般大众所不具有的,知识精英们热衷于将他们的研究所得以论著、报告、建议等形式向社会公开,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推动一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这其中,《物权法》的通过就是知识精英推动作用的极佳呈现。^[2]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的知识精英在利益面前,逐渐放下了身份中立,越来越注重对自我利益的追逐,在行使话语权时选择了妥协的姿态。因而,当前中国社会知识精英普遍存在的思维能力的孱弱,精神视野的偏狭,人文悟性的欠缺,道德意识的淡漠,甚至精神和心灵世界的委琐的现象,^[3]已不鲜见。因此,必须重建知识精英的精神世界。

所谓新阶层,是指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中产阶层群体,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4]。学界一般认可,新阶层中的多数成员属于社会的中产阶层。^[5]王甫勤从研究新阶层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信心入手,探讨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他的抽样调查的实证数据分析结果说明,“新阶层中的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总体上他们对社会发展较有信心”。^[6]张卫、张春龙在江苏的调查分析中指出:新社会阶层的阶层意识并不强烈,没有形成中产阶层的“我们感”;但是,虽然没有中产阶层的“我们感”,阶层成员之间在社会特征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均表现出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对执政党的认同度较高,部分新社会阶层成员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尚未加入相关政治组织的成员中,有接近40%的人员对中国共产党组织表示强烈的加入愿望。调查显示,在前面五个阶层中,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共党员的比例较高,达到了39.17%,而个体户阶层仅有20.18%的比例。在尚未加入政治

组织的成员中,个体户对加入中共党组织表现出了最高的积极性,比例达到43.19%。新社会阶层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改革开放的成败、党和国家政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关心;对社会公益事业表现了很高的热情。同时,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新阶层的个别群体,如个体户群体,强烈感受到没有一个真正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权益的“代言人”,从而造成他们在公共政策决策中丧失话语权。^[5]

这里所说的一般白领,指中产阶层中的普通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和社会团体中的各类文员,是中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张伟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当代二元性资源分配机制的制约,也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和政治体制的相对封闭,构成了一般白领阶层的特有的、内部异质化的精神世界:政治选举中的消极,民主追求上的“拜佛主义”^①,社会运动中的谨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业主维权中前所未有的热情与主动,对底层社会的既同情又鄙视,对权力阶层的疏远和对经济精英的肯定。而这些矛盾的认知、情感和参与行为取向,贯穿着一般白领阶层的理性线索。^[7]

2. 发生学视角的研究

发生学视角的研究,强调的是中产阶层社会态度发生条件与特定态度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从主观条件入手的研究、从客观条件入手的研究、主客观条件相结合的研究。

从主观条件入手的研究。主要认为“主观上对自身身份的归属(即阶层认同),是中产阶层积极、稳定的社会态度发生的重要前提”。李培林、张翼的实证研究模型反映:人们越是将自己认同在“社会中层”或接近“社会中层”的那些人群(“社会中上层”或“社会中下层”),他们就越认为当前国家的各项制度是公平的;人们越是将自己认同在“社会中层”或邻近“社会中层”的位置,就越不会将致富的社会原因归结为“非法致富”或“不公平竞争的致富”。但在对政府的态度上,认同中层也表现出对政府的不当行政会持反对态度。他们的研究验证,社会成员的认同阶层越高,总体上形成的社会公平感就越强,其对

① 民主追求上的“拜佛主义”。对佛的崇拜,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也就是“拜佛主义”倾向。民主追求上的拜佛主义,即期望民主这尊“佛”能够直接解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基本权利保障等诸多现实内容。而且,对民主所能带来的现实期望是短视的,并不会“未雨绸缪”,先推动民主建设而后期望民主成果。相反,只有在已经产生了诸多现实需求,而现有的社会资源取得方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才会想到要“拜”民主这尊佛。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在亲身体验了民主所具有的优势和所能带来的利益之后,才会产生民主建设的需求;否则,宁愿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利益诉求。见张伟:《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32-233页。

社会就越具有积极性的认识。因而,自我认同的“中层”,是一个具有社会稳定意义的变量,他们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偏好。^[8]李春玲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李培林、张翼的观点:白领阶层认同感越强,他们对现存政府政策和政治体制越持有肯定态度,对政府治理能力越信任,越认可政府的合法性和承认政府权威。同时相比其他阶层,白领具有更强烈的参政与民主意识,生活需求的提高使得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更多的要求。因此,他们是推动政治变革的推动力。^[9]

从客观条件入手的研究,有“微观论”和“宏观论”两种。“微观论”要数陈天柱、苏祥的“微观资本论”。他们在分析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及其社会态度中,对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和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维系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根据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人力资本对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形成有决定性影响,而依据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维系理论,权力资本对当前中国白领阶层意识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实证检验中,陈天柱、苏祥发现,在中国转型社会里,权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对于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及其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的形成均有明显影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其他人来说最有可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并对社会制度和政策安排有较强的认同感。这种现象可以用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来解释:在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对于中产阶层阶层意识的相应社会态度形成的作用力越来越大。同时又对倪志伟的权力资本贬值观点进行修正,在这一点上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维系理论更有说服力,即权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对于中产阶层意识和相应社会态度的形成都有较大影响力。同时他们还发现,权力资本对中产阶层意识和相应社会态度的形成的影响可以通过收入的持续增长而逐渐减弱,但人力资本对中产阶层意识和相应社会态度的形成的可能性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逐渐加大。^[10]

“宏观论”的代表是陆学艺的“宏观结构多元分

割论”。陆学艺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分层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受宏观的社会结构多元分割的影响,现阶段中产阶层在价值观及行为规范方面呈现出三种类型,并呈现一种多元且层化排序的结构。一是传统性的价值观——安于现状、循规蹈矩。典型者为个体户、小业主。二是现代性的价值观——开拓、进取、注重个人价值及其社会形象。典型者为公务员、办事员。其间,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及经理们更以注重实际的“实惠”标准,度量个人努力的社会价值。三是“后现代”观念——强调个性体验,不受社会规范约束。典型者为受雇于外企的“白领”、自由职业者等。^[11]

“宏观论”的又一代表性理论是李友梅的“综合宏观环境论”。李友梅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面向市场的那批中产阶层(李称其为S白领,并认为这一层面占中产阶层90%)的研究,说明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受到多种宏观因素的制约,包括历史发展阶段、文化遗产、社会结构、制度环境等。上海有着竞争的历史文化传统,^①又是今天中国改革的示范地区、开放的前沿地带。这种宏观环境对中产阶层认知、情感和行为取向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上海S白领具有竞争的激情,但又有一种焦灼感与压力感。“内部高速流动”的职业领域使他们有职业危机感;市场领域存在的某些不规范运作加剧了他们的焦灼与压力;西方导向性的生活、消费方式与现有收入水平之间产生的心理预期紧张。其次,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同时又是在社会发展风险中最有可能成为利益的受损者,所以经常会有“强政治取向”和“弱政治参与”同时表现的行为倾向。他们体会到政治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基本保证,也是他们继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他们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国家发展前景”有一种期待,因而,一旦他们觉察或预感到社会生活环境面临挑战或者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就会给予特别的关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自发地作出强硬反应。但是,他们对主流政治宣传话语集体淡漠,对一些重

① 由于20世纪初叶外国资本及其各种机构的进驻不仅从现实上改变着上海的就业结构,更以其现代性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对上海的社会结构发生着深远的影响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现代竞争原则的引入,而中国传统社会分层机制是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先赋性是其主导性的流动规则。而现代竞争原则建立在后致性规则的基础上,它承认主体的本质差异,鼓励主体通过提升个人能力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性流动,在为职业的自由转换提供可能性途径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分化。可以说,上海早期白领群体是这一新原则在旧有社会关系格局上造就出的新生儿,他们的出现是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的最初印痕。当时在各种外国机构中供职的上海白领群体既是这一现代竞争原则的产物也是这一原则的施行者。20世纪90年代相似历史情境下分化出的上海“新白领”,在生成机制上与早期的“老白领”是具有某种同一性的,因而他们在社会心理上也具有某种同构性。见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北京: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大政治事件“弱关心”，对政治身份抱持“无所谓”态度。再次，由于社会经历上的分化，不同年龄的中产阶层成员的价值取向有很大差异，尚未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公共知识体系和价值认同。^[12]

主客观条件相结合的研究。最典型的是李路路的研究。李路路首先认为，从主体本身讲，中产阶层的基本性质，规定了它的行为倾向的特殊方式。中产阶层是处于中间位置的社会群体，其社会结构位置处于以大财产所有者为代表的社会上层和以体力劳动者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之间。由于生产和服务的高度社会化、组织化，以及专业技术在生产和服务中的重要性，导致相应的社会结构位置从过去的两分结构中分化出来，在社会关系的结构中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和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又由于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是嵌在过去的两分等级结构中的，因而构成了它与上、下层关系的多面性。正因为中产阶层的这种中间性，其行为倾向呈现出矛盾性、依赖性、两面性、保守性和激进性的复杂形态。从主体本身讲，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又与其主观能力的变化相联系。当中间阶层力量比较弱小时，意味着社会结构中不存在需要它发挥作用的足够空间，其自身也不足以抵制可能来自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威胁，从而其社会态度会更多地彰显出依附性的特征；随着中间阶层力量的壮大，其生存的社会空间和能力都随之扩大，中产阶层所彰显的社会态度特征也就有可能发生变化。李路路同时认为，主观的态度不仅仅为主体本身的条件所规定，更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经济发展、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构成了影响中间阶层行为倾向的重要变量。^[13]

3. 功能意义上的研究

功能意义上的研究，主要是讨论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功能。重要观点有三种：一是积极的影响和功能。如陆学艺等认为，尽管中国当代中产阶层价值观及行为倾向出现层化现象，但总体上是积极的。他们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高，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是先进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消费者，他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习惯具有“现代化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如在社会生活中，积极进取，勇于创新，遵纪守法的精神；平和开放的心态；在公共生活领域中讲文明、讲秩序；积极参与有益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事务；辅助弱势群体，尊重个性选择；以合法手段积累财富，并适时回报社会等

等。”^[14]因而他们的认知方式、情感方式和行为倾向有利于中国当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周晓虹等认为，我国的中产阶层是维护政治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普遍都有一种强烈拥护既有政治体系的倾向”。^[14]“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基石”。李强认为，中产阶级代表一种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使得极端激进的思想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15]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认为中产阶层社会态度“比较温和”，“最希望稳定”，“有利于稳定”。^[16]

二是消极的影响和功能。认为中国当代中等收入者由于是中国社会转型早期的受益者，品位不高，政治态度比较暧昧、生活态度崇洋媚外、关系态度缺乏对底层社会的同情感。因而，中国当代中等收入者的社会态度对中国社会心理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所起的积极作用并不明显。比如，张翼认为，知识界津津乐道的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稳定器作用，放在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中，的确如此。但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基于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层现象的实证性研究发现，由于种种原因，中产阶级在国家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其内部某些群落的经济收益会出现下滑倾向，特别是当初因制度性漏洞和缺失而暴富的人群，会因为法制的逐步完善而失去敛财的机会，如果这种下滑倾向不易得到改善，这些中产阶级人群就会滋生对现存社会的敌意，进而发展成为“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17]向荣则认为，由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存在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特殊性，其社会态度特征就是它对权力和资本的依附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势利性。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纯粹的市场化和市民社会的历史产物，它的产生与形成是国家权力同跨国资本共谋的历史结果。政治权力与跨国资本是中产阶级形成的主导力量，市场只是一个伴生的温床。所以，从生存方式上说，新兴的中产阶级必须依附于资本和权力，才有进一步成长和发展的空间。这个阶层的独立性也就因其骨子里的依附性而被悬搁了，不仅如此，这种依附性还使它本能地生长出一种伴生物，那就是它的势利性。所谓中产阶级的势利性，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基本上是以自我利益作为处理公众事务和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参照系，自我利益高于一切。这个阶层缺少对自我利益的超越性和更加广大的现实关怀，对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也缺少道德理想和人文情怀，不少中产人士还有一种忽视乃

至歧视底层弱势人群的“厌贫意识”。因而,中产阶级不可能在现阶段担当起稳定社会的重大使命,他们最需要稳定的正是他们自己。^[18]

三是多维的影响和功能。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基本上是先进的、积极向上的,对中国社会心理的健康转型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但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早期,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并不定型,在某些人身上还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要么态度倾向上带有传统社会中等收入者的痕迹,比如政治态度上还有一定的依附性,生活态度上由于竞争压力太大而相对保守;要么盲目认同西方模式,对传统一概排斥,或信仰缺失等等。这样一种复杂矛盾的社会态度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功能也是复杂多维的。李路路认为:中产阶级特定的社会结构位置蕴涵中产阶级多样的社会态度,决定着社会功能特征的多种可能性。当中产阶级既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其赖以生存的等级秩序和权力结构又能保持,这时中产阶级社会态度是保守的,彰显出稳定社会的功能特征;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中产阶级的扩大导致与资本及权力发生冲突,中产阶级会由“依附”转向“激进”,即有一种试图改变社会结构的行为取向,彰显着变革的功能;中产阶级的本质在于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中间位置。因此,“秩序”特别是等级秩序对于中间阶层来说至关重要。如果社会秩序遭到了威胁或破坏,特别是当社会无秩序严重影响到中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以及经济发展时,即使是在民主政体下,中间阶层恢复秩序、维护利益的强烈取向也将导致它们赞成“权威政体”,这就可能导致颠覆的功能。^[13]

二、中国中产阶级社会态度亟需深入探讨

如前归纳,对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社会态度的研究已经有很多的成果。这些前期成果,触发了我们研究的灵感,打开了我们研究的思路,丰富了我们研究的想像力。但是,这种研究还只是开始。研究的角度虽然多样,但还没有形成系统性拓展;研究的观点虽然精彩,但还欠缺规律性发掘;研究的视域虽然纷呈,但仍需加强场域性探究;研究的成果虽然丰富,但还需增强功能性追索。

系统性拓展。这里所说的系统性拓展,是指对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社会态度的研究,应兼及其历史性和现实性、全面性和完整性。这里涉及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生成的宏观背景、微观机制;中产阶级社会态度的要素构成、一般特征;中产阶级社

会态度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能;中产阶级社会态度的正确引导等等。

规律性发掘。由于中产阶级构成成分的复杂性、结构位置的尴尬性、社会地位的飘忽性,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是一个矛盾体,有学者用“支离破碎”来形容。但是,不管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复杂程度、尴尬程度和飘忽程度如何,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中间阶层这一共通性,它的社会态度还是具有这一阶层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一面。寻求这一普遍性和必然性,探索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社会态度形成和演变的一般规律,才能从根本上洞察这一阶层的社会意识甚至是集体无意识的走向。

场域性探究。应该说,在不同的场域,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是有区别的,甚至会有很大的不同,更有甚者会存在冲突。丹尼尔·贝尔曾经用中轴原理来说明中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场域所表现的社会态度的差异性、矛盾性、分裂性。中国当代中产阶级在不同场域的社会态度是怎样的?政治社会态度、经济社会态度、文化社会态度、日常生活态度是悖谬的,还是可以统一的?是各自独立的,还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这些都需要通过研究得出结论。

功能性追索。从学者们的前述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的功能影响。不管是所论的积极性影响、消极性影响,还是多维性影响的研究结论,对中产阶级社会态度的分殊性功能的研究还不够。比如,作为思想动机,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规定着自身的行为;作为精神意识,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影响着社会价值文化走向;作为利益表达,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牵动着政府的决策思路并影响着具体路线和政策的制定。这些都需要深入探讨。

三、深入研究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社会态度的价值

首先,深入研究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社会态度,有利于准确判断这一阶层成长、成熟和变动走势。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处在重要的转型过程中。毫无疑问,对于这一转型走势的预期绝不是两极分化的“哑铃型”结构,而应当是中产阶级不断扩张的“橄榄型”结构。这是一种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性与合理性,有利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协调共处,有利于社会公正和安定,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努力追求的一种结构。这一结构的生成,不仅在于中产阶层量的放大,更在于中产阶层各方面素质的提升,在于中产阶级成为一个健康的、成熟

的现代阶层。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走势,正是其成长是否健康、成熟的重要表征,因为社会态度总是表达着某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对中产阶层的发育和健康成长起着内生性的导向功能。所以,准确判断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可以把握这一阶层的成长、发育的走向。

从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社会态度入手,判断其成长、成熟的程度,是研究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重要方法思路。应该说,这一思路来自马克思的研究无产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马克思曾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19]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和“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实际上是论述了工人阶级的自身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从自发状况向自觉状况发展的两个阶段。在初期阶段,没有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具有独立政治力量的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当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获得了自己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进入到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阶段,并通过一致的阶级行动去维护和争取共同的阶级利益,这时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就会成为政治上成熟的阶级,马克思称之为“自为阶级”。用马克思的思路来观察中国当代中产阶层,通过了解其对自身社会内涵的认识程度、对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和使命的理解、对自身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把握,可以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准确判断中产阶层的发育状况和变动走势。

毫无疑问,如果中产阶层在这方面还没有形成“自觉”的状态,就难以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产生认同,就难以和社会其他各阶层形成共处的共识,就难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与社会各群体之间形成有效协调。因此,社会政策的选择就必须更加有助于中产阶层的发育和成长,尽力促进这一阶层的发展和成熟。所以,在当代社会阶层结构加快转型的过程中,深入研究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准确判断这个阶层的发育、成熟状态,这种准确判断是理解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课题,是引导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思路。

其次,深入研究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

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形成正确的政策选择。

在刚性意义上说,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规范并引导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选择,当然首先包含着执政党对社会价值的追求,但同时也包含着执政党对社会各阶层利益和意志的整合,也是社会各阶层博弈而实现协调的结果。所以,执政党和政府在政策选择中,必须密切关注和深层次把握社会各阶层的社会态度。在当代中国,中产阶层越来越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政策选择中,丝毫不能忽视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

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安排。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安排,从关键性的意义上说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安排。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利益协调的基本路径是“提低、扩中”,中产阶层利益角色不仅不可或缺,而且越来越关键。因而,必须深入研究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确保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所反映的利益诉求进入政策视野。尤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多发时期,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党、阶层、民族、宗教、内外”五个方面关系,每个关系的处理都必须认真研究其重要主体——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从中洞察中产阶层的利益诉求,整合中产阶层的利益取向,协调中产阶层和社会各阶层的相互关系。这样,才能形成社会广泛政策认同,才能协调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各种消极因素,引导经济社会健康成长。

只有深入研究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才能积极引导中产阶层的政策参与。我国政策的形成过程是各阶层利益协调的过程,也是各阶层群众民主参与的过程。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教育程度高,政策的敏感度高,对政策的价值理念理解力高。所以,认真深入研究当代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针对其态度状况,合理引导其态度取向,充分调动其政策参与的积极性,才能有效整合其政策参与中所表达的利益要求。

只有深入研究和及时把握当代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才能合理形成政策创新机制。时代在发展,实践在变化,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必须“因时之变,以为之不备”,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积极创新。政策的创新机制,当然依靠执政党对时局的把握和对政策走势的积极驾驭,同时必须依靠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由于中产阶层的政策敏感性和理解力,以及中产阶层在社会利益关系变动中的特殊角

色功能,从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政策的合理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究竟如何。这样,就可以进行及时的纠错和适时的创新。所以,克服政策“路径依赖”,促进政策创新,必须认真深入地研究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

再次,深入研究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有利于为社会和谐、团结稳定形成正确的意识形态思路。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及其所引起的各种体制机制的变动,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现象日益明朗,因而,社会观念、文化思潮的多样性也日益强化,各社会阶层状况及其变动也使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变性日益加剧。多元、多样、多变,应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征候,但同时,在思想舆论环境的意义上也会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带来冲击,所以,要实现并维护社会和谐、团结和稳定,必须适应多元、多样、多变的局面,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这取决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思路。

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中产阶层既可能充当的良好的社会“稳定器”、转型关键期的“变革器”,也可能充当社会不稳定的“颠覆器”、社会精神衰落的“异化器”。而就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而言,不仅在量的意义上对社会“舆论场”发生重大影响,而且在质的意义上对社会思想舆论走势发生重要导向功能。中产稳,则舆论和;舆论和则社会安,这几乎是被现代化的历史一再证明的铁律。

当然,在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发育尚未达到量上的优势,但在社会“舆论场”中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视。由于这个阶层文化程度高,对信息的占有量大,因而,其社会意见所体现的理性程度高,社会意见的中肯度就比较高;由于这个阶层大量的成员从业于先进部门和关键部门,因而其社会意见的影响力也较大;同时,由于中产阶层与贫富两翼阶层关联度大,而又不和这两极处于对峙状态,因而其社会意见在两翼的共振度高。可以这么说,中产阶层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认知判断,他们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的情感反应,他们对现代化进程中特定对象目标(如增长、民主、自由、稳定、和谐、生态)的行为取向,将会左右甚至规定大众的社会意识。所以,执政党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深入研究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使这一阶层形成对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促进这一社会阶层社会态度的

积极化,并由此促进整个社会各阶层社会共识的形成。这些意识形态思路的探索,都离不开对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萧功秦. 中国当代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J]. 上海风, 2007(7).
- [2] 王珺. 知识精英在我国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分析[J]. 理论界, 2009(4).
- [3] 欧阳斌. 北大改革显示知识精英的精神和道德困境[J]. 凤凰周刊, (156).
- [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4-15.
- [5] 张卫, 张春龙.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特征分析—以江苏为例[J]. 江海学刊, 2006(4).
- [6] 王甫勤. 新的社会阶层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态度[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4).
- [7] 张伟. 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 第二部分.
- [8] 李培林, 张翼.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 社会, 2008(2).
- [9] 李春玲. 中国中产阶级增长及其现状[J]. 江苏社会科学, 2008(5).
- [10] 陈天柱, 苏祥. 中国白领阶层意识形成的两种理论解释及其比较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 2010(2).
- [11] 陆学艺.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54, 266.
- [12] 李友梅. 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05(6).
- [13] 李路路.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 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4).
- [14] 周晓虹. 中国中产阶级调查[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28, 399-324.
- [15] 李强.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 34.
- [16] 胡鞍钢. 中产阶级: “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 政治学研究, 2008(2).
- [17] 张翼. 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4).
- [18] 向荣. 想像的中产阶级与文学的中产化写作[J]. 文艺评论, 2006(3).
- [1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196.